

#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

雍 涛 陈祖华

一股研究领导科学的热潮正在全国兴起并取得了初步成果,这是值得庆幸的。然而要使这门学科从根本上站住脚,并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则必须对建设这门学科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为此,本文对领导科学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领导科学的学科建设目标,它的特定的研究对象与性质,基本内容与结构,以及研究方法、研究途径等问题,提出自己的一种看法,以求教于理论界的朋友与担负领导工作的同志。

—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曾经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于革命实践,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与政策,规定了适应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战略与策略,对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长期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创立了一整套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领导方法,表现了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导师关于领导方法与领导艺术的大量论述,既是他们长期领导工作经验的宝贵集结,又包含有丰富的理论内容,是为实践所反复证实的科学真理。它为我们今天建设一门适应于新时期需要的领导科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是我们在研究领导科学时所不应该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有的同志似乎不承认这一基本事实,我们认为是不妥当的。

当然,同样明显的事实是:从马克思主义产生到现在,时间过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课题,我国也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了,我们的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领导工作从内容到形式也必然要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首先,是领导活动内容的转变。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领导工作的内容应当由主要领导政治运动转变为主要领导经济建设。这不仅涉及到领导活动的内容,还涉及到领导活动方式的变化等许多问题。其次,是领导者的思想方法或者说思维模式也应随之发生变化。无论是从领导大规模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来看,还是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来看,无论是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还是实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都要求我们用系统或整体的观念来把握对象,解决问题。面对现代社会这一十分复杂的有机系统,不仅经验思维的模式不够用了,而且以分析为主的近代思维模式也不够用了,必须代之以系统综合为主的现代思维模式。再次,是领导方式必须实行从手工业方式到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转变。例如社会调查、试点工作，必须借助于电子计算机进行计算和分析。要完成领导工作的上述转变，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其中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就是建设一门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领导科学，并使之成为我国广大领导干部的必备知识。

那末，什么是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领导科学呢？从总的方面来说，我们原有的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领导工作中的运用，是为我们长期实践所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它的基本理论是建立在近代科学、特别是以三大发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是科学的第一次综合的产物。然而从本世纪中期以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不仅产生了，而且有了很大的发展，许多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接近和融合，数学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都向我们展示了科学在不断分化基础上又一次实现更高程度综合的趋势。因此在今天，我们有必要也有可能吸取现代科学优秀成果，诸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优秀成果，现代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未来学、人才学的优秀成果，使它的基本理论建立在现代科学包括横断科学、边缘科学的基础之上。因此，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领导科学的第一个涵义，就是要借助于现代科学的优秀成果，来丰富和发展它的理论内容。再者，我们原有的领导方法，侧重定性研究的多，而定量分析不够。这就为许多领导工作的科学化、精确化、规范化、程序化和高效率造成了困难。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原有的许多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都有可能通过横断科学、部门科学的中介使之具体化，并借助于数学科学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编制计算程序进行处理，达到迅速、准确的要求。因此，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领导科学的第二个涵义，就是实现领导工作的科学化、精确化和高效率。我们认为，领导活动的不少内容，如信息的收集与整理，规划与决策（无论是策略决策还是战略决策）等，原则上都可以进行定量研究，至于什么时候能做到什么程度，则要取决于科学技术手段的完善程度。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领导工作中经验、直觉、灵感与领导艺术的重要作用。

至于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领导科学，则必然要同西方的领导理论相比较，才能明确的加以规定。今天我们来谈论这个问题，有少数同志觉得很奇怪：难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领导科学与资本主义的领导理论的差别吗？我们认为有的。领导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并且具有应用科学的特点，但它无疑具有社会科学的性质。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不同，领导活动的性质、内容与方法也不同。例如决策理论，是领导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决策理论与西方的决策理论就没有差别呢？显然不能。至少在决策目标与约束条件这样一些方面，二者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我们的许多决策中不能不起重大作用。又如我们讲领导体制，就不可能也不应该忽视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我们讲领导类型，就不能限于一般的论述集权型、民主型和放任型，而应该考虑到社会主义民主、民主与集中、民主与专政对社会主义国家领导类型的影响。如此等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领导科学，必须是适应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适应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研究社会主义社会领导活动的特殊规律的科学。

不仅如此，我们要建设的领导科学，还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这里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包含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特点：其一，是要考虑到我国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多层次的经济结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因素给领导科学带来的影响。其二，是要考虑到我们党长期以来

形成的领导方法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方法的发展给领导科学带来的特点。其三，是要考虑到我国的民族心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给领导科学可能带来的影响。众所周知，日本企业管理与美国企业管理有许多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之所以形成，与东西方文化、日本民族与美国的传统的不同有很大的关系。管理科学尚且如此，领导科学就更不用说了。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忽视它的存在，忽视它对我国领导科学的影响，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 二

要建设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理所当然的应该对这门学科的对象与性质、它与管理科学的区别、它的基本内容与结构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问题具有元科学的意义，并且只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才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当然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代替领导科学本身的研究。

一门学科存在的权利，在于它特有的研究对象。因此，研究对象的确定，或者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地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对于一门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同志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sup>①</sup>从这个观点看问题，我们认为无论是领导活动，还是领导行为，都涉及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领导活动的主体与客体（它与领导者、被领导者是有区别的）的矛盾。它既是社会实践中区别于一般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的矛盾，又是人际关系中区别于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特殊矛盾。毫无疑问，领导活动既要涉及到人，又要涉及到物和事，领导者既要亲自过问下属，又要借助于对象化的组织机构去发挥自己的领导功能，并要在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基础上，作出各种决策加以实施，等等。但是，不管领导活动涉及的问题有多少，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则成为贯串于领导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的一个基本矛盾。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物要靠人管理，事要靠人去办，领导者要通过人去发挥物的作用。因此，研究领导活动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主体与客体的矛盾产生、发展与解决，以实现有效的领导，就成为领导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与此相适应，领导科学则是研究领导工作的性质、特点及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关于领导活动的一般过程及规律的科学。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领导科学是关于领导活动的诸种要素、结构以及这一活动演化的规律的科学。显而易见，无论是领导工作的性质、特点，还是领导活动的一般过程、规律、均是受领导活动中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所制约的。

在我国目前已发表的一些论著中，对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这一重大问题，有的未加论列，有的只是略加提及，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至影响到本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它与管理科学的关系、它的基本内容与结构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我们不能企求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能圆满地解决上述重大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探讨上述问题并使之具有某种规范作用，将有助于这门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一门学科能否成立，不仅要确定它的研究对象，还要进一步划定它的边界，解决它与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领导科学的划界，首先碰到的是它与管理科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问题。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领导科学是管理科学这个大门类的一个分支，它把管理科学中的领导行为抽取出来，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因此，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

方，但又有明确的分工和不同的特点。首先，领导科学需要把自己的眼光集注于研究领导层的活动规律，而管理科学则应着重于管理层活动规律的研究。其次，领导科学着重研究带有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问题，而管理科学则重点研究带有局部性、专业性、战术性的问题。第三，领导科学具有软科学性质，而管理科学则具有硬科学的性质。

与领导科学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对构成这门学科的基本内容及其结构的探讨。从我国目前已经发表的关于领导科学的一些论著来看，大多具有专题的性质，缺乏应有的理论规范，缺乏结构的严谨性和完备性。很明显，我们不能把属于行为主义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经验主义学派的东西简单地聚集在一起，就以为完成了构造学科体系的任务。不，这个任务远远没有完成。这些学派的理论规范是不同的。要构造我们所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的学科体系，则必须要有适应于完成这一任务的特有的理论规范。我们在这里强调理论规范的作用，不是说所有的著作都只能遵循一种规范去安排自己的内容与结构。在建设一门新的学科的时候，宁可存在多种不同的规范也许更为有利，或者粗浅地说，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讨同一门学科的内容与结构，对于学科本身的建设是有好处的。然而这并不是说，一本著作的内容可以不要一定的理论规范，可以不要结构的严谨性与完备性。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但不限于于现有哲学教科书所阐发的理论内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原理与领导工作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对领导科学的基本内容与结构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领导活动是一种有别于一般认识和一般实践的特殊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领导者的基本职责，就在于指导下属并带领群众，去有效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考察领导活动的规律，必须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揭示的人类认识运动和实践发展的一般规律为指导，去探讨它的特殊过程和特殊规律，即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领导活动是作为领导者的主体依据一定的目的，利用一定的手段，作用于包括被领导在内的客体，从而产生某种社会效应的过程。因此，领导科学的基本内容至少应当包括：（一）对作为特殊实践形式的领导活动的结构、性质与特点的考察；（二）对领导者获取信息、加工信息的途径、手段和方法的考察；（三）研究领导者预测、规划、决策的理论与技术；（四）研究计划的实施过程和主要环节；（五）阐明价值评判的理论与技术，以及反馈调节的机制；（六）研究领导者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的各种要素——经验、直觉和理性——的作用及相互关系；（七）探讨领导方法的层次与结构；（八）论述领导活动中任务、组织与人三者的相互关系；（九）探讨领导艺术及其与领导科学的关系；（十）对领导活动的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作全面考察。在领导活动的主体方面，应包括领导体制、领导类型、领导结构、领导素质、领导作风等问题，在领导活动的客体方面，应包括如何处理人、物、事之间的关系，探讨被领导者的思想、文化、精神、作风，以及如何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的问题。如此等等。在上述内容中，第（一）条至第（五）条，是关于领导过程的理论；第（六）条至第（九）条，主要是关于领导过程中的诸种要素、诸种方法相互关系的横向考察；最后，第（十）条，是关于领导活动的主体与客体、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性考察。把它们综合起来，就是一种关于领导工作的过程—结构理论，也是关于领导活动的系统结构与系统演化的理论。它的理论基础既不是唯科学主义，也不是经验主义，既不是行为主义，也不是生理决定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我们不能丝毫忽视现代科学以至现代哲学的优秀成果。

我们说，社会主义领导科学的理论基础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领导工作实践相结合不能没有中介。这个中介主要就是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横断科学，

同时也应该包括技术科学。领导活动绝不是某一个领导者的孤立活动,而是领导者、被领导者以及领导活动中的其他要素之间相互作用而构成的完备系统。我们只有对这一系统的要素、相互作用的机制、结构、功能以及它的演化规律有了深刻的了解,才能使这种活动富有成效。从另一个角度看,领导活动的过程,也就是获取信息,对信息加工处理,制定规划,作出决策,付诸实施,并通过价值评判、信息反馈,改进系统的活动方式,增强系统功能的过程。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控制与调节所管辖的系统,不断提高它的功效。因此,领导工作如果离开“三论”,就不可能科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现代领导科学。现代领导科学除了必须借助于“三论”的优秀成果以外,还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科学学、社会学、心理学、未来学、人才学等广泛的领域。因此,它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科学。

### 三

要建设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还有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就是探讨它的研究方法的基本方面。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提出了本门学科的建设目标,然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呢?

首先,要深刻总结我党长期以来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丰富的领导经验与领导方法,并使之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对领导的基本任务、实施正确领导的科学途径、干部路线、领导制度、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等问题作过大量的论述,我们应当作宝贵的财富,重新学习,系统地加以总结概括,形成完整的领导理论。例如,毛泽东同志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sup>②</sup>他又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sup>③</sup>不仅如此,毛泽东同志还为我们党制定了调查研究,相互通气,“胸中有数”,多谋善断,不失时机,善于当“班长”,学会“弹钢琴”,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等一系列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周恩来同志曾经对领导者的定义、领导者的立场、领导者的任务、领导艺术、工作方法、工作作风等问题作过深刻的分析,并且身体力行,表现了高尚的领导品格和杰出的领导才能。刘少奇同志指出:“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问题,决定问题,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情形。”<sup>④</sup>他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领导者的基本职责:“出主意,用干部”,作了具体的说明,并号召各级领导者要研究和掌握领导工作的规律性。陈云同志对领导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干部问题:干部的重要性、如何了解干部、挑选干部、提拔干部、使用干部、教育和培养干部等方面作了系统的论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研究领导科学的宝贵财富,应当加以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十分重视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人事制度,强调干部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领导方法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要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于领导工作,促进领导工作科学化。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发现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且提出了“思想不停滞,办事靠大家,放权要开明,服务要细致”<sup>⑤</sup>的新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对于这些新的经验,也应当好好总结。此外,还应当借助于数学科学、技术科学,使其中一些可以实现量化、具体化的方法量化、具体化。当然,这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需要有多种知识的综合。

第二,要有分析地吸取国外领导理论和管理理论的成果。本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大生

产、大工程、大科学的出现，西方管理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行为科学”理论、领导理论、决策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理论等等纷纷出现，并建立了管理学的许多分支学科，其中许多内容涉及到领导者的素质、领导类型、领导方式、领导行为、预测、规划、决策、激励理论等问题的研究；还有所谓“X理论”、“Y理论”与“Z理论”，涉及到被领导者的本性、需求、思想、心理、精神、作风等问题；这些理论中的积极内容和科学部分，我们应当在研究领导科学的过程中认真加以吸取，并做到为我所用。行为科学理论对工人在生产中的行为以及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进行研究，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它认为，新型的领导者的能力在于通过对职工的各种不同需要的满足来激励职工的“士气”，从而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目的。决策理论是一种研究决策行为的合理性，研究决策的目标、方法、步骤、组织、效果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它既运用了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组织理论等方面的成果，又运用了概率统计、计算机科学等技术科学的成果使决策工作程序化、精确化。系统管理理论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系统，把企业的运动过程看作是“信息流”和“物流”的运动过程，强调“信息流”促进“物流”；它要求管理者充分掌握信息、利用信息。为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注重研究企业的组织形态，使它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同时处理好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企业与环境的关系。权变理论认为，在企业管理中，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我们都应该认真地加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它纳入社会主义领导科学的轨道，并使之科学化、完善化。我国多年来的封闭状态，使我们对国外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几乎全无了解。现在把它介绍过来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在某些论著中一时出现生吞活剥、兼收并蓄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和不难纠正的。我们再也不能干那种一概否定外来科学文化的蠢事了。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毕竟不能把国外的那一套东西不加分析地全盘搬来。这是因为，西方的领导理论和管理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与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不同，因此有不少理论是不能照搬的。除了我们前面所涉及到的领导类型理论、决策理论之外，还包括领导体制、对人性的假设、对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的地位和作用的估计等问题，都应该进行细致的、深入的分析。我国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及干部的文化科学水平，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不能不考虑我们现有的消化能力和是否适用等问题。所以，吸取国外领导理论与管理理论的优秀成果的过程，也必须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

第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领导思想、管理思想和丰富的文化遗产。一个国家的领导思想、领导方式，是在这个社会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下形成的。因此，要在中国引进西方的领导理论和领导技术，建立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领导科学，不能不批判地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不能不研究中国古代的领导思想和管理思想。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记载中，有许多关于领导经验、领导艺术的生动记录。可以说，一部《资治通鉴》就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领导的教科书。当然它记载的多是帝王将相如何巩固他们的阶级统治的经验，而且其中还有许多权谋诈术。但是应当看到，历史上也有些比较开明的、能够推动当时社会前进的领导者，他们显示的领导才能和领导艺术，是值得重视的。楚汉之争，刘邦最后战胜项羽，就在于他不象项羽那样“嫉贤忌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而能够使用在某些方面比自己高明的部下。我国春秋时代军事家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总结了许多军事方面的规律和原理，对于军事科学的研究有重大价值，从管理学和领导学的角度来看，也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例如，孙子在该书的《计篇》中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

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这里，孙子认为从以上七个方面敌我双方的比较，可以预测战争的胜负。同样，这七个方面的因素，对于制定成功的领导战略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再如，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臆向齐威王的大臣田忌建议的赛马方法，就体现了“对策论”或“博弈论”思想。此外，我国古代长城的建设和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体现和系统工程和系统管理的思想。从工程上看，长城由各种不同的等级、不同形式和不同用途的建筑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在管理上，层层负责，形成一个由兵部指挥的，包括“镇”、“路”、“关”及城堡、墩台在内的“金字塔式”的多级管理系统。这个系统既是一个通过烽火台自下而上的信息输入系统，又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信息反馈指挥系统。还有北宋时代丁渭主持的皇宫修复工程，也鲜明地体现了方案选择的最优化原则和最优决策的思想，等等。所有这一切表明，在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领导学、管理学的思想是很丰富的，我们应当发掘、整理，有分析地加以继承和吸取，并使之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理论与技术。

当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不是我们党的传统领导方法、西方的领导理论与我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简单叠加，而应当从我国当代的客观需要出发，把现代领导理论同我们党的领导经验以及我国古代的宝贵遗产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就需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完整的综合理论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而且也是理论与实践，以及科学、技术、艺术、道德等等的综合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仅具有分离科学与反科学成果的作用，更有整合诸种文化、诸种理论为统一观点体系的能力。<sup>⑤</sup>因此，要把具有东西方文化不同特点、具有不同经济政治制度影响、具有不同理论规范的领导理论，改造成为一门具有统一的观点体系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就决不能缺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帮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去对具体科学指手划脚，但它对具体科学的基础、合理性、成果、价值进行分析，对不同民族、不同环境、不同理论规范影响下产生的学说进行整合作用，却是不能否定的。有的人或者由于不了解，或者由于偏狭，对此加以忽视，或者不屑一顾，其结果就必然实现不了建立一门具有统一的观点体系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的目的。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领导科学，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十分有意义的工作，需要有多方面的经验与知识，需要有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的密切合作，需要有几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我们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难得的第一步，也一定会迈出坚实的第二步、第三步……。

注释：

-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横排版）第284、760、493页。
-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页。
- ⑤ 见1984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 ⑥ 参阅费多谢也夫：《哲学和科学认识》。